

论语言类型与文字类型的制约关系

李葆嘉

内容提要 本文从自源文字与借源文字两方面探讨语言类型与文字类型的制约关系。论证了语言类型对自源文字发展导向的刚性限制和语言类型对借源文字因袭改制的弹性限制的原理。揭示了以单音节语素为主的汉语,使汉字声符先天缺失促成字母化的语言条件的事实。提出了文字发展的多元论、借用质变论及语言类型对文字类型的制约观将取代文字发展进化论的新观念。

壹、导论

文字类型的传统分类是图画、表意与表音,由于图画类以符号造型为分类标准,与后两类不一,故有其不足。较新的分类法是从符号功能出发,分为语段、表词、音节、音位(辅音/元辅音)型。纯粹类型之间有一些混合型,如辅音——表词型、音节——表词型与形声——表词型。根据符号造型可分为图画式、象形式、线条式等等。语言的形态分类法将其分为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及编插语。闪含语系与印欧语系诸语言为屈折型,但前者为辅音构成根语干的屈折语,后者为元、辅音构成或根语干的屈折语。

在自源文字的产生和演变、借源文字的因袭与改制过程中,语言类型与文字类型之间呈现怎样的制约关系?在国内尚未见系统阐述,本文试加探讨。

贰、自源文字的自在选择

一、文字画的综合与分解

原始文字由表达一定语言内容的文字画蜕变而来,并不排除还吸收了一些记号。文字画以综合与语段对应,或经分解与语词对应,将导致文字发展的最初两种方向。印第安、极北等民族的图画式语段文字,最重要的外部特征:它们不是一个个单独的图形,而是一组组或一套套彼此相联的图画,表达的是某个完整的在图形上未分解为单个词的信息。他们语言中的句子是一个复杂的编插结构。句子之外,就没有通常在别的语言类型中所见到的词单位。编插方式的语言结构,促使之滞留图画式语段文字阶段并且充分发展。由于编插语中的语言成份不容易从句中分离出来,因此这些文字也就难于过渡到语词文字。

与之相反,在公元前四千至二千年中期,苏美尔文字、古埃及文字及商代甲骨文都已经以表词文字的面貌出现。在要素为词的语言中,词的音义与词相应的图形符号之间的直观联系促使组画的分解。可以推定,粘着型的苏美尔语、屈折型的埃及语和孤立型的华夏语,这些语言中一旦象形符号获得与单词的对应关系,便很快超越了图画式语段文字,而

使表词方式在文字体系中占了主导地位,伴随着表音符号的出现,成为混合性表词文字。

图画式的东巴文与编插型图画式语段文字不同,纳西语的孤立型特点决定其文字是表词的,尽管残存语段文字的遗迹(如引导字),但它一字一音、一音一词,假借与形声都已具备,其自然发展趋向形声——表词文字。

任何一种文字画随着自身的发展,都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出现表词方式,然而沿着图画式语段文字的方向使之充分发展,还是向表词文字方向过渡,显然与语言特点有关。编插语中语言的综合占优势,非编插语中语言的分解占优势,语言的综合导致了文字的**综合**,语言的分解导致了文字的**分解**。

二、粘着型苏美尔语与音节分析

语言分解为音节这样的表音单位比分解为与词相符的表意单位要困难些。苏美尔语根词干的语音结构有四种:元音、辅元、元辅、辅元辅。单音节词极易形成音节概念,而表达单音节词的意字又易于转变为音节符号。苏美尔语又广泛使用附加词缀,音节分解比较自然。这种语音结构单一性与构词粘着性导致了音符的产生。通常是根词中用意字,而词尾后缀用音符来表达。辅音不单独参与构词,因而没有表示单个辅音的符号。尽管音节符号使用频繁。但由于该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同音词,所以不能放弃使用意字,并运用定符区别同音词,成为音节——表词类型文字。

三、辅音骨架根词干的埃及语与辅音分析

从语言中析出辅音音素比析出音节更为困难,但在某些语言里变得较为容易。这些语言中屈折变化的元音具有与构成根词干的辅音不同的语法意义。闪含语言正是如此,根词干通常由三个辅音构成(所谓三辅音原则),而夹杂在根词干内的元音通过屈折表现语法形式或构成派生词。反复出现的具有强调作用的辅音骨架,促使运用这种语言的人把辅音理解为至关重要语音要素。而文字只书写辅音,对理解语义并不困难,因为语法形式可以依据词序与语境来确定。因此,最初的辅音音素分析,并非出于自觉的技能,而是语言的天然特征赋予闪含人这种天才,此盖语音学源于西亚之内在原因。

古埃及语属闪米特语,约3300个根词中单辅音60,双辅音400,三辅音2200,四到六辅音600。某些单辅音根词的表词字用来做多辅音词的辅音符号;某些双辅音或三辅音的表词字也丢失了强辅音后面的弱辅音,转变为辅音符号。后来埃及语又向分析型方向转变,某些位置上脱落了阳性后缀或词尾辅音,这就增加了单辅音根词的数量,促进了辅音音符的发展。正由于元音不标,使辅音词干同音结构增多,不得不利用定符加以区别而产生了形声字。因此,除了文化传统的力量之外,语言和文字的运用情况也决定了该文字就是不能演变成纯表音,而采取辅音——表词类型。

四、孤立型单音节词华夏语与形声原则

从商代甲骨文的造型可以推断它起源于原始文字画,但迄今在华夏地区未发现复杂的图画文字,这似乎从侧面反映了华夏语的孤立型单音节词特点。刻划陶符与原始汉字不属于同一系统,而大汶口文化中发现的四个图画字与汉字可能有渊源关系。如果说华夏原始书写系统经历过图画形式,那极有可能是与东巴文相似的图画式表词文字。

甲骨文中绝大多数是单音节词,双音节组合甚少且多是专名。造字中象形、会意为主,常用形声字只有几十。用字中则广泛假借,可据形推其本义的不过百余字,而假借抽样检查高达75%。由假借原则产生的音节字符与由音节原则产生的音节符号有什么不同

呢?假借中的音节字符为一个完整的能满足单词需要因而与词对应的语音单位。音节原则中的音节符号,处于待拼状态,只与多音节词中的某一音节对应(苏美尔语根词干多为单音节,但与粘着性词缀合在一起还是多音节词),这一音节不能满足一个词的语音表现形式。华夏汉语一音一词,假借即以声托事,因声达义,而多音节语中表达词缀的音节并不涉及语义层面。假借字符只有个别性、随机性,音节符号才具有普遍性,凡此音节都可用此符号。

音节符号的形成不但依赖单音节词的存在,而且依赖于多音节词系统的存在。在单音节词为主的语言中,音节与词的对应关系,使之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起表音作用。由假借字符演变而来的声符只能谐数字或数十字,而不能进一步演变为这个音系中的某一音节的普遍代表物。与之相反,处于多音节词网络中的单音节词(如苏美尔语与日语),一旦被用作表音符号,就有演变为某一音节的普遍代表物的趋势。因此,单音节语中的假借字符与多音节语中的音节符号性质迥然不同。甲骨文不是音节文字,而是通过假借方式实现表音的单音节语词文字,即假借—表词文字。

假借方式的广泛使用,致使同音结构在字形上无从区别。文字可区分度降低势必借助形旁补偿,于是形声原则逐步代替了假借原则。从甲骨文形声字初显端倪到秦汉篆文形声字占80%,经历了一千多年,汉字的类型就变成了形声—表词文字。

叁、借源文字的自觉选择

自源文字由文字画演变而来,语言类型对文字发展的限定是自然的,故其选择为自在;借源文字则是外来的,尽管选择的历史契机或选择方式不尽相同,但一般总是表现为能动选择,故其选择为自觉。

一、因袭借用(不改变文字类型)

(一) 音节文字产生于粘着语,故非粘着语借用则不适应。

操辅音根词干屈折型闪米特语的巴比伦与亚述通过阿卡德借用苏美尔文字,虽然广泛使用复合法,使后一个音节变成表辅音符号,但仍不适应亚述巴比伦语。赫梯楔形文字借于巴比伦,每个文字符号只保留一个音节值,同时用表意字,使文字变得十分复杂,音节文字与元辅音根词干屈折型赫梯语也不相适应。机械因袭借用致使亚巴文字与赫梯文字不能向适合自己语言的音位文字演进,因而通过向音节文字借用的方式产生不出音位文字,尽管借方的语言类型有这种要求。

然而有原始图画文字操粘着语的以栏人,也通过阿卡德借用了楔形音节文字,但他们根据以栏语粘着与音节结构简单的特点而使之向纯音节文字演变。

(二) 辅音文字产生于辅音根词干屈折语,故非辅音根词干屈折语借用则不适应。

元辅音根词干屈折语借用辅音文字会使类型发生变化,或如希腊单独创制元音字母,或如印度使之元音化为音节文字。粘着语借用辅音文字,通常如维、蒙、满诸族仿希腊式而元音化。

在辅音根词干屈折语区域内,辅音文字也从最初的直接借用而逐步产生采用附加方式标明元音,演变为标元辅音文字。东方字母一般都通过阿拉米文字而起源于腓尼基文字。阿拉米语与腓尼基语相近,最初的文字几乎没有差异。亚述与巴比伦舍弃音节文字转而采

用了阿拉米文字。希伯来人采用阿拉米文字,在字形上演变出方形、草书及斜体。巴利米拉文字是流行在叙利亚的阿拉米文字变体,由此形成福音文字,随着基督教的分裂而分化为三种文字。在阿拉米与巴利米拉文字基础上产生了表达阿拉米语的那巴泰文字,从三、四世纪起开始用来表达阿拉伯语。所有被阿拉伯人征服并被强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阿拉伯文字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字。

在闪米特各国人民辗转使用辅音文字的同时,准确诵读祈祷文的需要使标元方法得以发展。用一定的辅音字母表示长元音的方法,称之为“阅读之母”(maters lectionis)。另一种是用补充符号的方法,或如巴比伦文,用缩小字母作为元音符号;或如希伯来文,用行上、行下符号标示元音;阿拉伯文则用直线和曲线。它们已不是单纯的辅音文字,而成为标元辅音文字,这表明辅音文字只是一种相对完善的文字。

(三) 形声文字产生于孤立语,故非孤立语借用则不适用。

操粘着语的日本、朝鲜借用汉字,音借方式使汉字成为音符,导致假名与吏读的产生,最终创制出适合本民族语言的音节文字。党项制定以会意、形声为主的西夏文,壮族造生字,白族用白文,越南制字喃,都是操孤立语的民族借用形声文字。

(四) 元辅音音位文字产生于元辅音根词干屈折语借用辅音文字的过程中,它适用于元辅音根词干屈折语诸语言。

欧洲的一些民族在利用希腊(或拉丁)字母表制作本民族文字时,一方面通常改变所借用字母表的结构和音值,改变的大小取决于希腊(或拉丁)语同新文字用以表达的语言在语音结构上差异之大小;另一方面改变字母的形状甚至总的书写性质,改变的大小取决于该民族书写传统及创制新文字时的文化风尚与政治状态。殖民扩张使元辅音文字在世界广泛流行,没有文字的语言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文字,有文字的一些国家也转而采用拉丁字母,这表明元辅音文字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毫无疑问,元辅音音位文字具有准确记录语言的语音形式的功能。但对于那些同音结构较多的语言,文字不仅记录语音形式,还必须反映同音结构在语序、语境中难以辨清的语义差别。认为文字仅仅记录语音而不反映语义的观点,显然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最初的表词字是由文字画演变而来的,其视觉形式与语义有关,而听觉形式才与语音有关。过分强调文字记录语音形式的功能,势必导致对同音结构较多的语言也绝对适用拼音文字的错误观念的产生。

二、改制使用(借鉴其它民族的文字体制要素,创制新文字类型)

(一) 操辅音根词干屈折语的腓尼基人借鉴辅音根词干屈折语的埃及辅音——表词文字,创造纯辅音音位文字类型。

作为新兴民族,腓尼基人没有传统文化的重负,具体历史机遇影响文字选择。书写老腓尼基语的是比布洛斯音节文字,继而使用原始伽南与原始西奈文字,以后又出现过乌加里特楔形辅音文字,公元前十二—十世纪才产生了腓尼基字母文字。

以上情况反映了腓尼基人选择文字类型的曲折经历。由埃及圣书体符号形式与苏美尔音节原则结合产生的比布洛斯音节文字不适合腓尼基语。既根据埃及文字形式又根据埃及辅音原则创制的伽南与西奈文字,是古埃及文字演变为腓尼基字母的中间环节。巴比伦文明的影响孕育了苏美尔楔形式样与埃及辅音原则相结合的乌加里特文字。但还是借鉴古埃及文字的形式与辅音原则创制的辅音文字成为腓尼基人的最终选择。

(二) 操元辅音根词干屈折语的希腊人借鉴腓尼基辅音音位文字, 创造元辅音音位文字类型。

远古希腊的亚该亚人借用了米诺斯音节文字(克里特线形文字B)。米诺斯语以开音节为主, 没有复辅音, 音节容易从语言中分析出来。但音节文字, 不便表示希腊语词尾辅音与词首复辅音。古希腊多利亚人毁灭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后, 其音节文字随之消失。

与腓尼基人的贸易往来及杂居, 使希腊人接受了辅音文字。与腓尼基根词干不同, 希腊语的根词干由元、辅音组成。许多词要靠元音区分, 只用辅音字母书写则相同。与腓尼基比较单一的词序也不同, 希腊语句中的词可以出现在不同的位置, 采用辅音文字并不能暗示该词的元音符号。

辅音文字的元音化途径在古希腊为什么不象印度经由辅音音节化的方式, 而通过创立特殊元音字母的方式呢? 这由于: 一方面音节文字对于具有多种形式音节结构和复辅音及词末辅音的希腊语极不方便; 另一方面表达腓尼基半元音和喉音的一些字母被借用时, 希腊人大概读成了希腊语的元音。也可能在读一些字母的腓尼基名称时, 丢掉首辅音而读成后面的元音。这样的读音在用希腊语书写文句时固定下来, 由此演化出元音字母。除了创制元音字母外, 还根据希腊语的特殊语音结构改变了辅音字母的组成。元辅音类型文字的产生使辅音文字发生了根本改变, 为语音的准确记录提供了便利工具。

(三) 操元辅音根词干屈折语的波斯人借鉴亚述巴比伦楔形表词——音节文字, 创制出楔形纯音节文字。

公元前六世纪, 西亚广泛流行亚巴楔形表词——音节文字与阿拉米辅音音位文字。阿拉米辅音文字对波斯语并不合适。迅速登上历史舞台的波斯人认为自己承袭了被征服的巴比伦王国的以往强盛, 可能也考虑到楔形文字的通用性质, 因此采取楔形式样, 借用音节原则, 创造了自己国家的文字体系。音节文字不仅能表示辅音, 也能表示元音, 与辅音文字相比, 较适合元辅根词干屈折语。同时, 在阿拉米音素原则的影响下, 波斯把表词字从文字体系中排除出去(仅保留四个), 从而使波斯文字变成了纯音节文字。

(四) 操粘着语的日本人借用汉字, 创制假名音节文字。

日本起初通过训读与音读的方式, 借用汉字表达日语。借助表词字可以表达不变化的根词干, 而表达粘着语中用词缀系统表示词的语法形式却十分困难。始利用开音节汉字作为音节符号, 继而演变出万叶假名, 最终发展为假名音图。但是由于日语中约70%的词来自汉语, 且有大量同音词, 因此不得不采取假名夹汉字的书写体系。现代日语文章中, 假名符号占总数60%, 汉字占40%。除了在小学课本及电报中用纯假名音节文字, 一般情况都采用的是表词——音节混合型文字。

三、借用的复杂性

(一) 选择的曲折性。

与自源文字只有语言类型对文字类型的自然选择不同, 借源文字则可以因历史机遇而自觉地多次选择, 以求适应本民族语言特点。

亚该亚人借用米诺斯音节文字, 但继起的多利人未采用。在文字空白二百年之后, 又借用了腓尼基辅音文字, 加以变革创造了适合古希腊语的文字。巴比伦人因征服阿卡德借用了不适应自己语言的音节文字, 后来又借用辅音文字, 并用缩小辅音字母作为元音符号, 以适合巴比伦语。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采用阿拉伯文字, 因辅音型文字不适合粘着

型突厥语,本世纪改用拉丁式元辅音文字。

共时二向选择透露较为复杂的文化心态。契丹于920年仿汉字制表词大字,四年后又仿回鹘文造拼音小字。前者是崇尚中原文化,而后者是适应其语言特点。这种情形与古波斯既通行阿拉米文字,又采用楔形音节文字相似。

腓尼基人的选择则更为曲折,经历了比布洛斯音节文字、伽南西奈辅音文字、乌加里特楔形辅音文字多次选择以后,最终采用了纯辅音音位文字。

(二) 选择的多元性。

腓尼基文字其表达原则与符号样式都借自埃及文字系统;波斯楔形音节文字其表达原则与符号样式都借自苏美尔—巴比伦文字系统。这些仅是一元借用。

乌加里特文字表达原则借自埃及,而符号式样仿自苏美尔;蒙古文字母构成借自回鹘文而竖行书写是受汉文影响;朝鲜文表达原则来自西域胡书及汉语等韵学,字式方块却仿汉字。这些都是多元借用。

古日尔曼人向敌手拉丁人借来表达原则,使原先的竖线与斜线组成的表词符号具有音值而形成北欧文字;爱尔兰人熟悉了拉丁字母以后,也给自己的计算符号赋予音值,成为欧甘文字。由这种方式创制的文字具有借用与自产的双重性。

(三) 选择的机遇性。

文字借用除受语言制约之外,往往还受诸多非语言因素的影响,使选择具有机遇性或偶然性。这些因素有地域相近、贸易往来、征服同化、宗教信仰、文化辐射、文化趋同、殖民引进、一语两国等。

元辅音根词干屈折型的梵语适合元辅音文字。由于地域相近与贸易往来,印度商人熟悉西亚辅音文字与音节文字,因此通过辅音文字元音化的方法产生了婆罗米文字。由于地域遥远未能接受希腊式文字。

喜克索斯人征服埃及采用辅音文字,阿卡德人、巴比伦人征服苏美尔递相借用楔形文字,则是征服者为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同化;反之,阿拉伯、罗马帝国在其占领地区推行阿拉伯、罗马文字,则是被征服者受征服者的同化。前者是自觉同化,而后者是被迫同化。

阿尔泰语系的一些民族,由于信仰伊斯兰教而采用不适合粘着语的阿拉伯文字。朝鲜、日本与越南借用汉字,党项、契丹、女真仿汉字制字,则因中原汉文化辐射所致。

西班牙、葡萄牙、英、法等国的文字体制变成美洲、大洋洲中一些国家的文字体制,并在亚、非殖民地广泛流传,这是殖民引进。

乌尔都语和印地语都源于古梵语,非常相似。前者用阿拉伯文字书写,后者用梵文字母书写。生活在中国境内的柯尔克孜人与苏联境内的吉尔吉斯人为同一种族,因信仰伊斯兰教用阿拉伯文字,但后者本世纪先后改用拉丁字母与斯拉夫字母,是由于一语两国。

一个民族先后借用多种文字,可能出于不同原因。回纥从八世纪采用突厥文;后又使用仿照中亚商业语言粟特文字母创制的回鹘文;十世纪起因宗教信仰改用阿拉伯字母。如今中国境内的维吾尔人使用在察合台文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维吾尔文。住苏联境内的维吾尔人先用拉丁字母,1946年又改用斯拉夫字母,则表现为文化趋同。

肆、结论

一、在文字的历史发展中,必须区别自源文字的自在选择与借源文字的自觉选择。

在自在选择中,语言类型对文字的选择限制似乎是盲目的,其实以不知不觉的方式体现选择必然性,即何种语言类型只能自然发展出某种类型文字。尽管某些发展阶段对不同的自源文字是共有的,但也不无差别。同样是图画式文字,编插型印第安语为语段类型,孤立型纳西语为表词类型。同样是表词文字,但粘着语促使其文字向音节方向发展,辅音根词干屈折语促使其文字向音素化方向发展,孤立语促使其文字向形声化方向发展。语言类型对自源文字发展导向的刚性限制表现为:(一)图画式文字是否演变为表词文字,取决于该语言是否能析出词这样的语言单位;(二)表词文字孕育出何种表音方式,取决于该语言易于析出何种语音要素。

二、以单音节词为语根而滋生新词,在书写系统中或表现为相应的文字假借,这使汉字的表音方式一开始就注定难以摆脱语义羁绊。一个语根可表现为数个字根,但以某一字根为中心派生的一组同源字则共用一个声符。不仅依赖形旁指明义类,而且声旁在表音的同时也透视语义(一般是特征含义)。同源借用使声旁不可能上升为纯音符,具有偶然性、随机性的非同源借用声符也只能在极小范围内使用。以单音节语素为主的汉语,使汉字声符先天丧失了促成字母化的语言条件。

三、在借源文字的自觉选择中,因诸多因素的影响使语言类型的选择呈现一种偶然性,但在绝大多数场合语言类型总是通过改制或重选的曲折方式表现出语言类型对文字类型的弹性限制。

粘着语适应音节文字。粘着语如借用辅音文字会从使用标元法走向仿希腊式元辅音文字。元辅音根词干屈折语借用音节文字,或将混合性音节文字改制成纯音节文字,或舍之而重新选择。辅音根词干屈折语借用音节文字,只得弃之重选。

辅音根词干屈折语适应辅音文字。辅音根词干屈折语借用辅音文字,会随着应用的要求而采取标元方式。元辅音根词干屈折语借用辅音文字会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元音化,或创制元音符号使之成为元辅音文字,或经辅音元音化成为音节文字。

单音节孤立语适应形声文字。单音节孤立语借用形声文字,会根据该民族语音系统创制方块字。粘着语借用形声文字:或通过“音借”创制音节文字;或根据拼音及等韵的原理,创制合体音节文字;或采取两套文字制度。

元辅音音位文字具有准确记录语音的优良功能,所有的语言都能用它记录语音。编插语一般多引进元辅文字,但切罗基语却采用印第安人塞霍亚(sequoyah)从自己的语感出发而设计的音节文字,使用一百五十年认为无必要做任何修改。表达音位使编插结构太长,而音节文字使之相对缩短。

四、拼音文字与表词文字既反映语音又反映语义不同,它将反映语义排除出去,仅记录语音音节或音位。这对于多音节语、同音结构极少的语言比较适用。对单音节语、同音结构较多的语言,实行拼音文字则影响文字区分度。创制一种新的文字类型——双拼表义文字(由义符与双拼式音符组合成字),可视为汉字变革的一种尝试(见《袁晓园汉字现代化方案简介》),然而音符与义符表达功能的递减性与衰变性,仍令人困扰。

五、文字类型演变的进化论模式与语言类型演变的进化论模式,是上一世纪生物进化论在语言文字研究领域的机械搬用,与文字发展的多元状态格格不入,对语言类型与文字类型的制约关系漠不关心。

除了单纯的形体变化与符号增减以外,所谓文字的演进程序有两种含义:(一)某一个别文字体系内部不同表达方式的出现顺序。如汉字系统内象形、假借、形声方式的依次出现。(二)某一文字类型的演进程序。如由苏美尔音节——表词类型,经亚述巴比伦表词——音节文字,发展为波斯音节类型;或如由埃及辅音——表词类型,经原始西奈、迦南文字,发展为腓尼基辅音音位类型,又由此突变为希腊元辅音音位类型。前一种情况发生在自源文字内部,后一种情况是自源文字与借源文字的衔接发展。

最先产生古老文明的民族创造了具有广泛影响的自源文字,但因其文化传统的保守性及语言方面的原因未能进行根本变革,尽管这些文字中已孕育出新类型的因素。只有那些没有传统文化的束缚而迅速走上历史舞台的新兴民族,才能将旧类型中的新因素解脱出来,创造适合自己语言的全新的文字类型。

总而言之,文字发展的多元论、借用质变论及语言类型对文字类型的制约观将取代文字发展进化论。

主要参考文献

(苏) B·A·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美) 肯尼思·卡兹纳《世界的语言》(黄长著,林书武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语言学论文选译(第五辑)》(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陈炜湛《甲骨文简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李葆嘉《“句”字右文说》(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3期)

李葆嘉《试论文字发展基本规律的虚构性》(武汉华中师大《语言学通讯》1988年1期,又载《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论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版)

《陈鹤琴全集》第一、二卷出版

我校第一位校长、已故幼儿教育家陈鹤琴的论著,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以《陈鹤琴全集》六卷本出版,现第一、二卷已经问世。全集的出版,为研究陈鹤琴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提供了比较全面的资料,对研究我国现代教育史和教育科学有重要价值。全集的第一卷是儿童心理卷,收集作者的九篇论文和一本专著。发表于1925年的《儿童心理之研究》是我国最早的研究儿童心理的专著,作者用观察实验的方法,以自己的孩子为研究对象,对婴幼儿的身体发展和心理发展持续观察了808天,对感觉、动体、情绪、语言、思维、好奇心、学习、游戏、道德等发展情况逐项记录,研究并揭示了幼儿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极富创见。

全集的第二卷是幼儿教育 and 家庭教育卷,收入论著43篇。作者在论著中抨击封建主义的幼儿教育观,批评国民党政府轻视基础教育的幼稚教育的政策,对他在南京鼓楼幼儿园的教育实验进行了总结,提出办幼儿园要适合中国国情、幼儿园要和家庭合作的主体。在幼儿教育方面,他主持应以大自然、大社会为教学内容,以幼儿的生活经验为筛选标准,以季节、时令为编排顺序,以某一知识或任务为单元活动中心,以活时间长短确定单元长短。陶行知在评价《家庭教育》一书时说,这本书是做父母的必读之书。(朱述宾)